

和平崛起：轉型中的中國國際戰略與對台戰略思考

Peaceful Ascendancy: the transiting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new
thinking in China's Taiwan strategy

王崑義 *Wang, Kung-Yi*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蔡裕明 *Tsai, Yuh-Ming*

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Ph.D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inland China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中國在歷經中共十六大的人事調整與 SARS 疫情的衝擊之後，正在進行一場外交政策的轉型。中國外交的「和平轉型」主要是以「和平崛起」與「非傳統安全觀」來建構其體系，並建立新「國家形象」以破除中國威脅論，在「道

德政治」的理想主義旗幟下，擴大中國參與國際對話的空間，用以展現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和平轉型」的外交思維中，中國的對台戰略也出現變化，現階段對台戰略的主要作為與想法，可分為以下五個部分：第一，戰略包圍台灣；第二，建立「藍綠合流」的緊急應變系統；第三，推廣「非傳統安全觀」及於台灣；第四，對台「三戰」的推出；第五，經濟包圍台灣。基於此，中國認為台灣問題不可能走得太遠，和平崛起可以化解台灣問題與中國周邊爭議，甚至兩岸問題可能會向前推動。

After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SARS diseases, China transiting it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a adopts “peaceful ascendancy”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s the basic guideline. The purpose of “peaceful ascendancy” theory is to build national image and get rid of China Threat theory, enlarge China participates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witches it policy toward Taiwan. China’s Taiwan policy contains five sections: contain Taiwan via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alert system of Taiwan politics, populariz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o Taiwan, propose 'three-wars' -legal war, media war and psychological war on Taiwan, besiege through economic influence. Therefore, China considers that Taiwan can not escape from China’s control. Furthermore, China believes that peaceful ascendancy will resolve peripheral disputes, includes Taiwan sovereignty.

關鍵字：和平崛起 非傳統安全 中國對台政策 和平外交 睦鄰外交

Keywords: Peaceful Ascendanc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ina’s Taiwan Policy, peaceful diplomacy, good-neighborly diplomacy

壹、前言

中國在經歷十六大的人事調整與 SARS 疫情衝擊之後，正進行一場國際戰略的「和平轉型」。¹這項轉型的起源，主要是從中共十六大的舉行開始，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有關「國際形勢和對外工作」部分，曾提出一個「和平與發展」的主軸，並總結八條對於國際和外交工作的具體經驗，以及以「四個主張」和「六個繼續」作為中國新時期外交工作的指示。²這個報告不但標誌中國共產黨正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也呈現出中國政府試圖從「戰時革命體制」的國家，向法理型的「現代體制」國家轉變，它更改變著中國的國際戰略觀、國家身份定位以及具體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³

在此之後，中國總理溫家寶於 2003 年訪問美國時，在哈佛大學所舉辦的一場「把目光投向中國」演講會中提出：「今日的中國是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大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中國不能完全依賴大國，同時也要進行體制改革。」⁴這是中國重要領導人首次在國際舞台上，正式提出中國要建立一個「和平崛起」大國的發言，所以頗受到國際間的關注。各界對於中國將如何建構新的國際戰略觀，以及未來可能選擇的外交戰略到底為何，紛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¹ 有關「和平轉型」的概念，早先中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室主任楊潔勉就使用這個概念來指涉新世紀初期的國際關係現狀，他認為這項轉型是世界進一步呈現出多極化的趨勢，國際關係的主題也從超級大國之間不可調和的競爭以及近乎零和的遊戲，轉變成為民族國家對民主、和平和發展的關注。而中國上海復旦大學美國中心孫哲也使用這個概念來指涉中共十六大以後中國外交發展的趨勢。參閱楊潔勉，《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外交政策比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 38；孫哲，〈結構性導航：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方略〉，《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 年 12 月，總第 280 期，頁 58。

² 所謂「四個主張」為順應歷史潮流，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並且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六個繼續」為繼續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區域合作；繼續增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繼續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繼續堅持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繼續廣泛開展民間外交。參見江澤民，〈江澤民在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02 年 11 月 8 日。

³ 馮玉軍，〈2003 年中國外交〉，《現代國際關係》，2003 年第 12 期，頁 37。

⁴ 參見溫家寶，〈把目標投向中國——在哈佛大學上的演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03 年 12 月 10 日。

例如，在 Evan Medeiros 與 Taylor Fravel 發表於「外交事務」季刊 (*Foreign Affairs*) 的文章當中就提及，中國對於雙邊關係、多邊組織與安全議題反映出現今中國外交政策的彈性與練達。⁵日本學者船橋洋一 (Yoichi Funabashi) 則以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將面臨到兩大挑戰：一個是中國必須尊重國際關係準則，中國必須平等地對待其他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第二是中國必須找尋防範美國的辦法。⁶台灣前駐南非大使陸以正也認為，「和平崛起」是中國正採取一種開放務實的新外交。⁷新加坡聯合早報也指出，西方輿論正逐漸改變對於中國的態度，不只是因為中國是逐漸重要的經濟實體，而是中國在重大的國際事務當中，逐漸成為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⁸也就是說，現今中國國際戰略所出現的「和平崛起」新思維，正逐步成為中國現階段對外政策的方向。

事實上，從冷戰結束以後，中國一直把國際形勢定位為「一超多強」的準多極體制。⁹在中國的觀念中「力量的多樣化」(diversification of power)，不僅浮現在軍事、經濟、意識形態等多種形式的表現上，而且還體現在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的作用上。¹⁰因此，中國認為各國能夠相互合作，尋求「求同存異，共同發展」，這是國際社會得以向進步方向發展的關鍵因素。¹¹

然而，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美國以軍事為中心進行反恐戰爭所呈現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傾向，並不斷祭出「先發制人」(preemptive war)的戰略擴張，用以主導所有的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¹²特別是美伊戰爭以後，美國做為全球主宰「超級霸權」角色，更讓中國深感有必要重新建構「有中國特色」新國際戰略的急迫性。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的研究員王逸舟就分析 2003 年美伊戰爭以後的全球發展特點指出：第一、在「一超多強」力量格局

⁵ Evan S. Medeiros and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3, p. 22.

⁶ Yoichi Funabashi, "China is Preparing A 'Peaceful Ascendancy'," *IHT*, December 30, 2003.

⁷ 陸以正，〈開放務實的中共「新外交」〉，《中國時報》，2003年10月27日，版15。

⁸ 杜平，〈中國和世界：究竟誰在變？〉，《聯合早報》，2003年12月12日，版15。

⁹ 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日、俄、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317-319。

¹⁰ 陸保生，〈世界多極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解放軍報》，2003年9月1日，版11。

¹¹ 孫哲，同註1，頁58-59。

¹² David Bromwich, "Acting Alone," *Dissent*, Winter 2003, pp. 19-21.

不變、大國戰略安全關係相對穩定前提下，地區熱點和局部戰爭繼續頻繁出現，危及鄰國與周邊地區的安全與和平；第二、恐怖活動已經變成國際焦點議題，「文明的衝突」將加劇；第三、戰爭型態發生深刻的改變，由少數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所發動的高科技戰爭，將加強了新時期軍事衝突的不對稱特徵；第四、國際建制（regime）網絡遍佈世界各個角落的不同領域，傳統國際政治學所說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將受到全球範圍制度化的約制。¹³

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爲了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¹⁴以及避免「和平與發展的周邊環境」遭到破壞，於是提出「和平崛起」戰略思維，是有意作爲繼江澤民時代所主張的「大國外交」之後，一項正在發展中的外交新戰略。畢竟，「大國外交」中所內涵的霸權與主導式的國際角色，¹⁵容易引發各國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憂慮，尤其是「中國威脅論」一直在國際間瀰漫不散，讓中國意圖扮演一個和平的角色而不可得。因此，透過「和平崛起」理念的推廣，變成是胡錦濤時代有意改變外交思維的新戰略。

另一方面，「和平崛起」在戰略層次上，對於美國在九一一事件以後，以軍事手段解決恐怖主義問題的一種反動。在美國仍然維持它在國際間超強地位的局勢下，大國幾乎對國際事務已經沒有插手的餘地。爲了解決這種窘境，中

¹³ 李慎明與王逸舟主編，《2004年 global 政治與安全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10-11。例如2004年2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於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也指出，中國將推動「多極主義」。他說，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中國主張國際關係民主化，透過對話和合作解決爭端，世界上的事情應由各國平等協商，反對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參見胡錦濤，〈胡錦濤主席在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text from <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hzxcfofsg/t59124.htm>，2004年1月27日。

¹⁴ 中國學者屈從文認爲構成「負責任的大國觀」，應該包含以下面向：1、核心概念是進一步的趨近文明、正義，根本目標是追求大國的國家利益，但在思維及行爲方式上與傳統的大國觀不同。2、它要求大國認同多元共處和相互依存爲當今國際社會的基本特徵，尋求國際社會的共同安全。3、承認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國際社會民主化進程進一步的發展。4、大國在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時，主要是用和平的外交、經濟和文化的方式，避免武力和武力威脅，以多邊對話、平等協商達到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相對平等。參閱屈從文，〈負責任的大國觀〉，《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2年10月，總第266期，頁77。

¹⁵ 此外，中國只有在最近幾年來才在世界上向大國的地位邁進，才在大國外交中發揮作用，但從整體而言，中國在以西方為主體的國際社會中處理國際事務經驗不足，缺乏協調能力，使得中國認爲必須在進行現代化的轉型當中，提高整體外交能力。楊潔勉，〈重要戰略機遇期與中國外交的歷史任務〉，《中國外交》，2003年第12期，頁10。

國於是寄望「和平崛起」能夠凝聚國際力量，用以分散美國獨霸的強勢作為。

本文的主旨是想從國際戰略的角度剖析中國所稱的「和平崛起」的意涵，以及它透過「和平外交」實踐所呈現的意義，其中所擴及到的「非傳統安全觀」的建構與對台所推出的新戰略思考，都是本文所要解決的議題。本文作者所採用的研究文獻，除了一般性論文與書籍之外，作者並透過親身參與中國學術界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與訪談的結論，希望能做有系統的綜合性分析。當然，這種田野式的調查研究方法，也許部分資料會顯得不夠嚴謹，¹⁶但卻是補足由於中國官僚體系過度封閉性，而造成的資料不足窘境的最佳研究方法之一。

貳、「和平崛起」觀念的推出及其戰略構想

中國總理溫家寶於 2003 年 12 月 10 日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所提中國將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被外界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對世界的一個重要承諾，也是中國今後戰略工作思路。中國在外交戰略思維上的改變，胡鞍鋼就認為，顯然是中國領導人已經注意到「人多、不發達」的中國要發展，如果是採取資源消耗型並且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外部資源的模式，就勢必會與其他國家發生嚴重衝突，也會走向 18、19 世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舊路上去。綜合當今時代的趨勢和國際社會的種種內在、客觀的制約因素，中國若走上這樣的崛起道路，即使能夠僥倖的達到發展的目的，也不會是持久的，甚至是會立刻盛極而衰。因此，他們認為更應該注意採取內斂的姿態，走集約式、內延擴張式的崛起道路，才能實現「和平崛起」的戰略意義。¹⁷

當然，「和平崛起」概念的推出，最早在 2003 年 10 月於海南島所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時，當時溫家寶在會議的演說中就使用到「亞洲崛起」的概念。而會議裡中共前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則接續以「中國崛起和亞洲的未來」的演講，指出中國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必須要堅持三個重要戰略：第一，

¹⁶ 石之瑜，《大陸問題研究》（台北：三民書局，1995 年），頁 200-208。

¹⁷ 莊禮偉，〈中國：建設性地崛起〉，《南風窗》，2004 年 1 月 1 日。另外，參閱胡鞍鋼，〈是威脅論還是互利論——中國經濟崛起對中日經貿關係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2 年 9 月，總第 265 期，頁 33-38。

「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證：銳意推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基本內涵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第二，「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大膽借鑑吸收人類文明成果，堅持弘揚中華文明；第三，「和平崛起」的社會環境，統籌兼顧各種利益關係，包括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因素、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¹⁸

另外，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也指出：「和平崛起就是在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下，既參與全球化又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表明中國不是靠對外擴張和軍事對抗崛起，而是在市場競爭中與各國實現共贏。中國一方面要大踏步地對外開放走向世界，利用國外的資金和資源，另一方面也要全面開放中國的市場，讓國外資金進來，給世界各國提供發展的機遇。由於，中國的這種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是前所未有的，我們把它稱為和平崛起」。¹⁹

從這樣的陳述來看，「和平崛起」在當前中國的觀念中，既具有經濟發展的意義，也有國際戰略的價值。他們希望中國在經濟崛起以後，能繼續轉向「和平外交」的建構，讓中國的崛起變成是國際間的正面形象，而不是負擔。

一、「和平崛起」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意涵

如果不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思考「和平崛起」的戰略意涵，而是以國際關係的角度來解析這樣一個議題，本質上，它是有意凸顯中國在當前美國以「軍事為中心」，並選擇走向「權力政治」的路徑中，把自己的外交理念轉向以「和平為中心」，並選擇走「道德政治」的道路。也就是說，中國並不想在崛起的過程中，採行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realism)的價值觀，而是有意凸顯「理想主義」(idealism)的「道德政治」模式，以消弭國際間普遍瀰漫「中國威脅論」的看法。

¹⁸ 這項理論研究，中共中央撥款二百萬元人民幣，指定由鄭必堅組成以中央黨校教授為主的理論班子，積極建立「和平崛起的中國」的理論。顯然鄭必堅對「和平崛起」的分析，相當程度代表著中國高層的看法，〈胡錦濤下令建構和平崛起理論〉，《聯合報》，2003年12月16日，版13。

¹⁹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12/content_1362512.htm

畢竟，現實主義與其說是「科學」的研究綱領，無寧說是一種政治哲學或世界觀——對人性與道德的悲觀，對人類是否能建立一個自由與和平世界的質疑。現實主義者也試著描繪出追求安全、威望、權力與影響力（包含了領土的控制、其他國家行為的掌握或是世界經濟）。²⁰但是現實主義備受批評的就是他們所研究的兩個假設「單元」(unit)與「結構」(structure)。Arnold Wolfers則稱這兩個部分為邪惡 (evil) 與悲劇 (tragedy)。「單位」的意義在於過度強調武力的重要性，根據這樣的看法，國際政治的特質出於人性對於權力的渴望，強調國家之間對於利益的競爭是自然的，國家之間並不是基於不安全感而來發動戰爭，而是基於某些國家本身的侵略性。而「結構」所指的就是現實主義忽視個人與國家的特質，只有強調國家間的權力分配，外部環境限制國家的行為，忽略國家本身的意圖，儘管行為者的立意良善，但往往不能保證其所追求的結果。²¹

中國學者王紹光就批評現實主義的理論本身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反映出一種焦慮，必須要對形勢做最壞估計。也許中國的「和平崛起」不會「修正」世界的格局，但是他們會假設最壞情況的出現。現實主義裡面有一種隱含的悲觀主義的世界觀，它總是做最壞的打算。歷史上所有的經驗都告訴人們國家相對地位的改變會導致擴張，為什麼中國會是個例外？中國學者出國參加會議往往會被問到這個問題。「和平崛起」戰略的提出，就是對現實主義以及其他帶有各種情緒的中國批判者的回應，回應國際上的懷疑——中國到底會不會採取合作的、和平的方式來發展自己。²²

在王紹光的批評中雖然沒有指出「理想主義」的說法，但他所使用的「合作的、和平的」論述作為回應現實主義觀點的看法，卻是「理想主義者」所常使用的「道德語言」，而「道德政治」則是「理想主義」所堅持的信念。通常，理想主義者對人類理性懷抱著極大的信心，也認為理性是促使人類進步的原動

²⁰ Randall 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December 1997), p. 927.

²¹ Michael Spirtas, "A House Divided: tragedy and evil in realist theory," in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Benjamin Frankel, ed.(London: Frank Cass, 1996), pp. 386-388, 395.

²² 王紹光，〈和平崛起與國家良治〉，《21世紀經濟報道》，2004年2月15日。

力。因此，理想主義中的「理想」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行動。透過信仰，可以讓社會統一和團結的凝聚力得以發揮；透過行動，他們不僅在解釋世界，也要改變社會。於是，他們依據某種道德的理念，將社會的約制，轉化成對團體的忠誠，這也是「道德政治」得以發揮的關鍵。²³

在這個前提之下，國際政治中的理想主義，他們所共同的著眼點在於追求「和平的戰略」，以及更美好世界藍圖的浮現。數個世紀以來，理想主義的目的就是希望讓國家擺脫國際政治的糾葛，使得在理想主義眼中的國家是可以要求自制進而履行承諾，國家外在行為的保證其實是源於內部的政治道德。²⁴也因此，他們認為一切個人、團體與國際關係，皆可納入一個司法架構，藉由這個司法架構，得以消除權力政治追求所帶來的國際衝突。同樣的，主權國家間的外在權力政治，也必須轉化為內部法律的關係與和平的政策。如此，國際間就有了和平的法律秩序，透過這個和平的法律秩序，可以設立一個最高的法院，以仲裁國際間的衝突。因此，理想主義者是把國際秩序的建構，立基於國際法的普遍性適用上，並以此作為建立理想世界的制度架構。

然而，過去以來「理想主義」所要建構的國際秩序，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一直面臨困境。布爾（Hedley Bull）就認為，國際法本身並不足以產生國際秩序，因為它不能夠把國際社會的觀念，確定為最高的規範性原則，並使之獲得承認。因此，只有當國家在某種程度上相互承認對方的生存利益，國際法才能產生基本的共處規則，也才能維持基本的國際秩序。²⁵這個原則，若從集體行動的邏輯來看，國際秩序的建構原是依賴國家間集體行動所促成，但因國際社會中一直缺乏公共權威，以及政治、經濟權力分散導致多元中心並存的狀態，使得國家間集體行動結果，並非造成「合作擴展」的自發秩序，反而也是呈現國家各自為政的「無政府狀態」。

就以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國際間所選擇發展道路的分歧性，就可以理解

²³ Theodore A. Coulombis and James H. Wolf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and justice* (N.J.: Prentice-Hall, 1982), pp. 9-11

²⁴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1 (autumn 1996), p. 56.

²⁵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37-138.

「理想主義」對國際秩序建構之困難。中國學者江凌飛就指出當前國際間所選擇三條治理道路有：一是美國化的模式，即美國單邊行動和單極霸權的模式，就是國際秩序要由美國來統治和管理；二是歐洲主張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反應發達國家廣大中產階級政治傾向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主張；三是中國所主張的多極化模式，其基本內涵就是國際社會公平化、國際政治民主化、國際經濟平衡化、國際文化多元化。²⁶所以，他就主張中國新的國際戰略思考，應該在「六對關係」中規劃，即國際形勢中的變與不變的關係；安全環境中角色轉變的主動與被動的關係；對外交往中合作與鬥爭的關係；維護戰略穩定與講究戰術進攻的關係；國家安全建設的積累是推進與跨越式發展的關係；保持穩定與制度創新的關係。他認為這「六對關係」就是六對矛盾，是推動中國安全戰略在新世紀有所作為的內在動力。²⁷

只是，江凌飛所提出的這「六對關係」，把它放到國際關係中進行思考，仍過於龐雜。因此，王濤認為要解決國際衝突和增強合作的方法，唯有依靠「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的建立才能達成。當然，建立這個「國際制度」的主要條件，首先是每一個國家都應有平等參與集體行動的自由選擇權；其次是國家在集體行動中進行互惠的策略行動；第三是通過國際制度的建構來塑造合作的價值觀與信念。²⁸

王濤所提出的這種偏向「理性選擇」的行動準則，顯然是有意透過「國際制度」的建立來達成國際間合作的目標，但這種觀點在 2003 年美伊戰爭中卻遭到了挑戰。由於美國不理會聯合國的制約，執意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使得冷戰以來以聯合國為依歸所建立的國際制度架構蕩然無存。因此，面對新的國際局勢，中國學者就認為有必要尋求新的解釋架構，以補充理論上解釋的貧困。

在這方面，中國學者何懷宏就以「國際關係倫理性」的思考做為起點，他把問題拉回到羅素 (Bertrand Russel) 最根本的主張，也就是「生存原則」在

²⁶ 江凌飛，〈關於國家安全戰略選擇的若干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2 年 11 月，總第 267 期，頁 7。

²⁷ 江凌飛，同上註，頁 11。

²⁸ 王濤，〈社會困境與國際秩序的建構——國際治理的一種闡釋〉，《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2 年 10 月，總第 266 期，頁 16。

人類生活實踐與國際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以重新找回國際關係中道德的涵意。他認為，在羅素的道德涵意中，國際間爲了建構一個永久的和平，它的條件是建立一個國際權力聯合機構或者說是世界政府，但如果一時沒有別的辦法而又形勢緊迫，那麼一方讓步乃至屈服，可以成爲選項之一。²⁹羅素這種爲避免核武戰爭所提出的「理想主義」的「生存原則」，被何懷宏視爲是在美伊戰爭後，仍可適用的國際政治原則。他認為「生存原則」此項道德義務，在國際政治中主要表現是應當盡力避免暴力和戰爭，在戰爭中應該盡力避免殘酷和毀滅，尤其是避免傷害平民和無辜者。³⁰

另一種對「理想主義」思想的梳理，則表現在伐兵與程曉燕的文章中，他們從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的國際政治思想裡，重新詮釋他在當代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他們兩人指出，過去中國學者在研究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思想時，通常會犯了兩項偏差的觀念：一是他們偏離現實的理想主義；二是他們認爲威爾遜是披著理想主義外衣的美國式帝國主義。³¹由於這兩項偏差，導致中國對理想主義沒有給予好的評價與看法。因此，重新審視威爾遜的國際思想，應該從他對現代性的認識著手，也就是現代性在加強人類社會進步與相互依存的同時，一旦失控將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而威爾遜的國際政治思想是現代性所要求的產物，其中的現實意義，則是表示美國在當時需要有一個和平的發展環境，才會有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出現。³²

另外，浙江大學的教授余瀟楓也在「和平價值至上」的觀念之下，提出一個「共優範示」的國際倫理的理性法則，它主要內涵包括：社會共有、權利共享、和平共處與價值共創。他認爲當前體現這種「共優範示」的模式，主要是超越邊界安全機制的建構，如聯合國、歐盟，以及人們正在積極探索的全球治理機構。當然，「超越邊界」的涵意，余瀟楓認爲是指超越主權限制、讓國界

²⁹ 何懷宏，〈生存原則如何在國際政治中起作用——國際關係倫理思考之一〉，《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4年1月，總第281期，頁9。

³⁰ 何懷宏，同上註，頁13。

³¹ 伐兵、程曉燕，〈論威爾遜國際政治思想的理論源泉〉，《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4年2月，總第282期，頁31。

³² 伐兵、程曉燕，同上註，頁31。

相對消失，或者在主權讓渡基礎上進行共同合作，而形成的國際制度化的互動關係。³³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在面對美伊戰爭以後國際和平再造的可能性發展，中國學者已經在積極的探詢中。這之間，不管是羅素「生存原則」的再提出，或者是重新詮釋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甚或是「共優範示」所主張的「超越邊界」的和平價值意涵，本質上都可以把它視為是「和平崛起」背後一些理論性思考的方向。因此，如果依照中國學者的詮釋，那麼「和平崛起」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應該是以「理想主義」作為定位，從這個方向來看，本文作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項原則來進行思考：

(一) 它是在新的國際局勢下，中國所追求的一項「生存原則」

從布希政府上台之後，美國被認為是一直服膺於「單邊主義」所追求「帝國戰略」(strategy of empire)的實現，這種「帝國戰略」正如美國學者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言：「美國單獨行動，預先採取行動，放棄國際組織與規則，讓美國謀求操縱世界秩序。在這種世界秩序中，重要的是美國要對全球進行控制。美國不允許其他國家發展出與美國對等的力量，也不允許美國的首要地位受到挑戰。無論這種挑戰是來自敵對陣營，還是自己的盟國。」³⁴在這種「帝國戰略」的牽引作用下，美國正進行全球的「戰略轉型」，華盛頓方面以高科技所武裝的高度機動性軍力，強化與盟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在全球範圍內傳播美國的價值並進行反恐的鬥爭，³⁵以優勢武力在全球進行戰略擴展，建立起美國領導世界的地位與霸權體系。

中國過去對美國的戰略是採取制衡的原則，唯多年來反霸的效果不彰。現今中國因懾服於美國的「帝國戰略」，為了避免被國際社會推上與美國爭霸的

³³ 余瀟楓，〈從危機對抗到優態共存—廣義安全觀與非傳統安全戰略的價值定位〉，《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4年2月，總第282期，頁12-13。

³⁴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 and the Ambivalence of Power,"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2003, Vol. 102, Issues. 667, p. 377;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 2002, p. 44; 孫哲，同註1，頁63。

³⁵ Dagulas J. Feith, "Transforming the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3, 2003; 高凡，〈美國戰略轉型和全球安全〉，《爭鳴》，2004年1月，頁75-76。

角色。胡錦濤上台以後，在外交戰略上改採「和平崛起」的觀念，它的意義就是避免衝突並尋求健康的經濟與技術的交流，換句話說，就是一種「妥協政策」(policy of accommodation)。³⁶這樣，不但可以免於直接衝撞美國勢力所帶來的窘境，並可與美國繼續維持其對話的關係。³⁷也有別於美國熱中實行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而轉向理想主義「道德政治」的旗幟之下所推出的戰略思維。因此，「和平崛起」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妥協政策下的「生存原則」。

(二) 「新發展觀」作為實現現代人類社會進步與相互依存的原則

2003年秋季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曾提出一項「科學的發展觀」，依照胡錦濤的說法，主要內容有：

第一、是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主要任務是：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第二、是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改革。堅持統籌兼顧，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係。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第三、是要統籌推進各項改革，努力實現宏觀經濟改革和微觀經濟改革相協調，經濟領域改革和社會領域改革相協調，城市改革和農村改革相協調，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相協調。³⁸

³⁶ Denny Roy, "China's Reaction to American Predominance," *Survival*, Vol. 45, no. 3(Autumn 2003), p. 66.

³⁷ See *Asian Street Journal*, "U.S., China Show Signs of Solidarity," December 5, 2003, p. A1, A5.

³⁸ 參閱胡錦濤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所做的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講話。

溫家寶就把這項所謂的「科學發展觀」歸納為：「要站在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高度研究解決『三農』問題，實行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堅持區域協調發展。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以人為本的全面性發展」。³⁹香港《文匯報》據此直接稱為「新發展觀」，它是指「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⁴⁰

從上述說法，顯然中國最近以來在經濟發展的策略上，是有意把它調整為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回到以現代性作為基礎的平衡發展策略。特別是在 2004 年 1 月中共發表第六份「中央一號文件」之後，⁴¹解決農業、農村與農民問題的所謂「三農」政策，以及試圖增加農民收入的說法來看，未來胡錦濤時代政策方針將走向扭轉過去重城市、輕農村，重沿海、輕內地，重工人、輕農民的作法。所以把「和平崛起」視為是調和中國內部發展不平衡，建構一個兼顧現代性發展全國統一市場的目標，這樣就可以避免中國走向擴張型的發展路徑，從而引發外界對「中國崛起」產生「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三）是在「和平價值」的觀念，實現「共優範示」的和平原則

從 1955 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揭示「和平共處五原則」以來，⁴²「和平」

³⁹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2/21/content_1325267.htm

⁴⁰〈溫總今將闡述「新發展觀」〉，《文匯報》，2004 年 2 月 21 日。

⁴¹ 中共從 1982 年至今，總共發佈過六份一號文件，顯現農業問題在中共中央文件都局於首位。1982 年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當中肯定「包產到戶」與「包幹到戶」的制度，說明其不同於改革開放前所實施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並認為這種的「雙包」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成分。1983 年在《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上，提出政策方向在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4 年在《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問題的通知》上，表示為了鼓勵農民對於土地的投資，規定延長土地的承包期從 3 年到十五 15 年。1985 年在《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上，表示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取消農副產品統購統銷的制度，並對糧食、棉等少數重要產品採取國家計畫合同收購的制度，中共並將農業稅從實務稅改為現金稅。1986 年在《關於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部署》上，將改革的重心放在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這五份文件是在強調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業結構的調整以及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楊亮，〈中國農村改革歷史進程綜述〉，《北方經濟》，頁 20-21；許人俊，〈中央五個農村一號文件誕生記—圍繞包產到戶的一場新舊思想鬥爭〉，《炎黃春秋》，頁 10-11。中共為求解決農民收入增加的問題，在 2004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上，提出如何擴大農民收入、擴大農民就業、開拓農產品市場、深化農村改革等措施，目的在於增加農民收入，用以擴大中國大陸的國內內需，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預防中國可能再出現的通貨緊縮的問題。

⁴² 「和平共處五原則」是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

概念一直是中國設計國際戰略的主軸。即使是鄧小平在 1980 年代中期所推出的「和平與發展的周邊環境」國際戰略，1990 年代江澤民時期的「大國戰略」，也都是以「和平」作為建構中國國際戰略核心。

例如，在和平主題方面，鄧小平自 1985 年初，即開始對世界戰爭必然性的論點提出修正觀點。鄧小平指出，現代世界上真正的大問題、帶全球性的大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說發展問題。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將鄧小平的思想表述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十四大報告稱之為「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徵」，也就是說，中國對世局的評估認為當代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他和過去以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時代不同。⁴³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大國外交」戰略中所設定的和平主題，這項戰略目的是為實現中國現代化進程總目標服務，主要內容應以大國關係為主體，把中國與大國關係放在重要位置上，協調好中國與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國家的關係。在推進世界的多極化、解決全球性問題等方面承擔與中國大國地位相適應的責任與義務。⁴⁴

由於，中國向來是以「和平」的概念作為建構其國際戰略的核心，因此，「和平崛起」中所訴求的「和平」，仍然會是繼承這一概念作為建構的基礎。然而，在進入全球化時代，當前「和平」價值的展現，仍然應以余瀟楓所稱的「共優範示」作為內涵，也就是包括：社會共有、權利共享、和平共處與價值共創的原則，以實現「跨越邊界」所進行的合作關係。

綜合上述的「生存原則」、「發展原則」與「和平原則」，作者認為可以把它連結成為如（圖一）中的思考，其中「生存原則」是最為底層因素，也是一般戰略設計最核心的議題。「發展原則」則是牽引中國的生存與和平價值的方向，中國正以「新發展觀」做為新一代領導人主政的目標。最上層則是以「和平價值」做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主要外交理念，特別是「價值共享」方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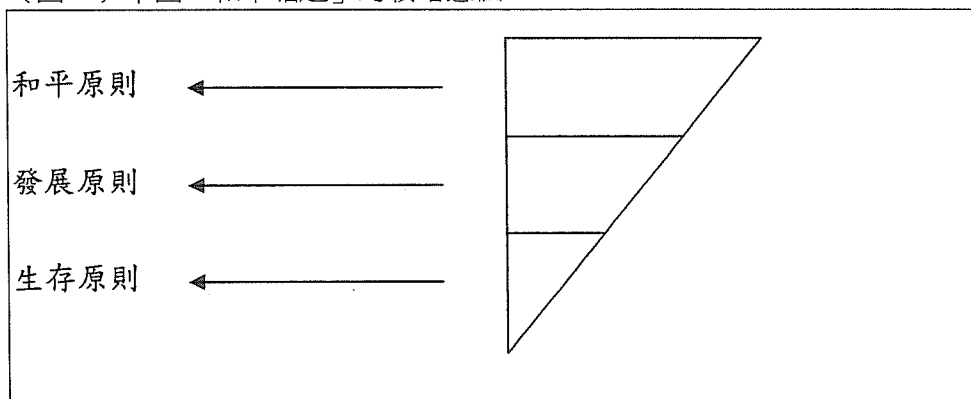
處等五項原則。

⁴³ 顧德欣，《鄧小平國際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7。

⁴⁴ 葉自成，〈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關於中國外交戰略的幾點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0年第1期，頁5-10。

主張，以有別於美國獨佔全球權力的「霸權作為」，這也是符合國際政治中「理想主義」的道德意涵。

(圖一) 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意涵



由作者自繪，圖中所表述的是中國在設計和平崛起國際戰略的內在意涵，其中底層是生存原則，中層是發展原則，最上層則是和平原則。

二、「和平崛起」的國際戰略設計

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知名學者費正清 (John Fairbank)，曾以同心圓的分層結構，作為分析中國對外關係的地緣戰略架構。其中第一道圈層為「中國文化圈」，所指涉的是中國邊界上的國家。第二道圈層為「亞洲內圈」，在中國邊界外，但卻是中國的權力所能及之處。第三道圈層為「外圈」，主要是中國權力所不能及之處。⁴⁵

費正清所設定的這三個圈層的地緣分析架構，實質影響著中國學者對國際戰略的看法。例如，北京大學教授葉自成就認為中國「大國外交」戰略設計應以東亞為中心，把中、俄、印度、印尼、日本等五國，作為建立東亞地區秩序的主導國家。而在實現「多極化新戰略」的目標下，它的關鍵應該在於：爭取歐洲的聯盟與轉化美國的霸權取向。⁴⁶

⁴⁵ 王生榮，《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54。

⁴⁶ 葉自成，〈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關於中國外交戰略的幾點思考〉，頁7-8。

另外，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楚樹龍在分析中國外交戰略，也是以類似圈層的战略觀指出，中國未來的外交戰略設計應採取：（一）亞洲地區戰略——從雙邊到區域合作及一體化戰略；（二）美歐俄戰略——伙伴和對手的選擇；（三）中東、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戰略——應採取發展外交。他認為在這樣的戰略設計上，中國還需配合多邊外交的戰略，這樣可以讓中國通過國際體系內的努力，逐漸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促進實現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則、主張和理想。⁴⁷

事實上，如果回到費正清的三個圈層的架構下來看，作者把它修正為現今中國對「外圈」的美國，正採取著避免衝突的「和平外交」政策；對中間圈層則以歐亞大陸為主體，特別是在對歐盟部分，中國已經對歐盟提出「三個願意」的「善意外交」；⁴⁸對於亞洲內圈與中國文化圈則採取「睦鄰外交」政策，而貫穿這三個圈層就是凸顯中國的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如圖二）透過這三個圈層的地緣戰略架構，在中國遠程的戰略設計上，崛起的中國是期望恢復歷史上的「中央王國」的地位，⁴⁹在亞洲建構「中國治理下的和平」，在形式上重建「朝貢冊封體制」，⁵⁰以有別於美國以軍事向全球拓展的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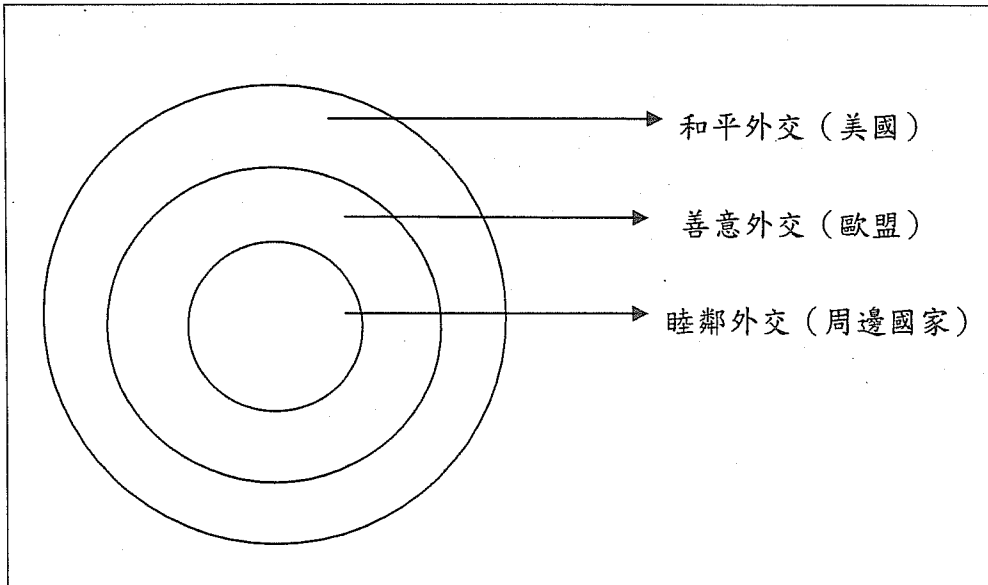
⁴⁷ 楚樹龍，〈全面建設小康時期的中國外交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年8月，總第276期，頁11-13。

⁴⁸ 2003年10月13日，中國發表了首份對歐盟的說貼，說貼中明白的指出：「中國願意本著互尊互信、求同存異的原則，促進雙方政治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願意按照平等協商、互利雙贏的精神，推動雙方各領域的全方位合作；願意在相互借鑒、取長補短的基礎上，擴大交流，增進中歐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友誼。」這就是所謂的「三個願意」，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⁴⁹ Richard Halloran, "China: restoring the middle kingdom," *Parameters*, summer 1998, p. 56.

⁵⁰ 參考黃適卓，〈從「大中國思想」看中國與連宋為何反對公投〉，《自由時報》，2004年2月13日，版15。

(圖二) 當前中國地緣戰略設計的構圖



圖二由作者自繪，最核心的圈層是指中國對亞洲周邊國家及中國文化圈採用睦鄰外交戰略，第二圈層則是指對歐盟地區採取善意外交戰略，第三圈層則是指對美國採取和平外交的戰略。

如果更詳細的分析其中的發展，那麼在第一道圈層上，中國正在周邊建立南北的合作框架。西北邊是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與中亞國家開展經貿合作以及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與分離主義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的基本任務。而積極促成與俄羅斯邊界的確定，以及石油供應鍊的協商等，也基本解決了北邊長久以來兩國的爭端。東北方面則積極的介入北韓核武問題，並主動促成中、美、俄、日、南北韓等六國參與的「六方會談」。中國的目的除了想藉此提昇自己在區域安全的影響力，並以外交工具實現國家利益的考量之外，更大的目的是為了證明「中國的崛起」並不會為國際間帶來更大的麻煩。⁵¹

南邊則以十加一（東協十國加上中國）與十加三（東協十國加上中國、南韓與日本），⁵²以實踐在 2003 年的博鰲亞洲論壇當中繼續提出的「與鄰為善，

⁵¹ 許知遠，〈六方會談：危機中的歷史機遇〉，<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2346.html>

⁵² 阮宗澤，〈睦鄰、安鄰、富鄰—建構新時期中國的大周邊外交〉，《解放軍報》，2003 年 10 月 20 日，版 9。

以鄰為伴」外交方針，不僅要睦鄰還要富鄰，以實現共同發展，⁵³並且讓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成為中國特色和平強國之路的一部份。⁵⁴

在第二道圈層方面，歐亞大陸西邊的歐洲在中國地緣戰略上的定位，不僅反映在歐盟的向東擴張和歐元的推出上，而且還體現在雙方經濟利益的相互依存方面。此外，中國提倡要建立一個多極化世界，歐盟應該是其中重要的一極，⁵⁵使得中國在對於歐盟的政策上傾向於更多善意的表示，特別是促成歐盟解除自 1989 年六四事件以來的武器禁運，中國對此更是不於餘力。中國在 2003 年 10 月 13 日公布第一份對外政策的報告書，把歐盟做為推動國際多極化的支柱。在 10 月 29 日中國與歐盟高峰會上說，中國將秉持「三個願意」來開拓與歐盟之間的關係，再輔以正式的國際條約義務和正式的雙邊、多邊合作行動加以確認和落實。顯然，中國對歐盟所釋出的善意舉動，正顯現中國有意在歐盟地區實現它的「善意外交」戰略。

在第三道圈層主要設定的目標就是美國，搭配第二圈層的對歐盟「善意外交」，中國試圖把兩個地區進行連結，從而實踐「雙重聯繫制衡」戰略，也就是區分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以及與美國之外所有大國的關係。⁵⁶藉由這項「雙重聯繫制衡」的戰略，達到避免讓美國過度擴張，以實現「和平外交」的理念。

事實上，從美國在 2003 年堅持對伊拉克出兵，而引發主要的歐陸國家，包括法國、德國與俄羅斯的強力反對之下，當時的國際局勢似乎出現海陸兩大集團對抗的形勢。中國的立場，開始時是強力的站在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歐陸反戰立場上，及至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呈現一片優勢的局面後，中國的立場似乎轉向維持中立性。當然，有關中國的態度方面，中國學者張天蔚在他的一篇討論文章中就明白的指出：「中國的態度可能或有不得不的選擇立場，我以為在這次事件中，中國的策略一定是檯面堅持反戰立場，尤其是反對美國繞開聯合國的單獨開戰，但其實不會採取真正的措施—比如在安理會表決中行

⁵³ 〈中國將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區域合作〉，《解放軍報》，2003 年 9 月 23 日，版 4。

⁵⁴ 傅夢孜，〈2003 年中國外交〉，《現代國際關係》，2003 年第 12 期，頁 37。

⁵⁵ David Murphy and Shada Islam, "It's More Than Lov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12, 2004, p. 29.

⁵⁶ 時殷弘，〈中國近期主要對外戰略問題〉，《戰略與管理》，2003 年第 6 期，頁 21-22。

使否決權，以阻止美國開戰。尤其是『在聯合國框架內』的開戰主張，中國的態度看似磨磨唧唧，但這正是一種策略的反映。」⁵⁷

張天蔚所指出中國這種模糊性的「策略反映」，其實就是「雙重聯繫制衡」戰略的使用。也就是中國既要拉攏歐盟國家，又想跟美國維持戰略伙伴關係，中國必須在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當然，這個平衡點正如楚樹龍所指出的，中歐關係主要是在經濟和國際問題上的協調，但有時經濟利益要大過國際安全的利益。然而，中美的關係卻存在更為複雜的問題，如美國普遍存在的「中國威脅論」，與對台灣問題的干涉，使得雙方的矛盾與分歧無法消除。因此，中國對美國關係持續保持「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戰略方針，也是不會改變的戰略。⁵⁸

因此，如果總結胡錦濤上台以來的一些外交作為，這有如中國官方媒體在回顧 2003 年中國的外交行動時，把中國的外交劃分為「周邊國家、世界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三個層面，並把中國外交工作的佈局概括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認為中國外交在 2003 年向世界展示了開放性、參與性和創造性思維，中國新領導人更趨廣闊、更加靈活、更加務實的外交思路，正在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打造一個有利的國際平台。⁵⁹

而香港的媒體也分析，胡錦濤顯然不希望重蹈江澤民「大國外交」的政策路線。畢竟，江澤民的「大國外交」，事實上是一種「浪漫外交」，換言之，只是中國的一廂情願。而胡錦濤的外交政策路線，則是在鄧小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外交思路基礎上提出的，但又具有自己的特點。例如，鄧小平主張重點應依靠第三世界，而胡錦濤主張更多依靠歐洲，依靠東協國家。另外，對於周邊國家，鄧小平和江澤民都主張實行「相互制約」的外交政策。但胡錦濤則希望與周邊國家實行一種協調關係，也就是使中國能保有一種協調的能力，

⁵⁷ 張天蔚，《論美伊衝突時的幾個不同角度》，參閱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cache:cFu_ag7DV48J:news.sohu.com/91/23/news206782391.shtml+%E7%BE%8E%E4%BC%8A%E6%88%B0%E7%88%AD%E6%99%82%E4%B8%AD%E5%9C%8B%E7%9A%84%E7%AB%8B%E5%A0%B4&hl=zh-TW&ie=UTF-8

⁵⁸ 楚樹龍，同註 47，頁 13。

⁵⁹ <2003，中國由大國外交到務實外交>；參閱

<http://www.phoenixtv.com/home/news/review/200401/01/179678.html>

以促成中國真正的「和平崛起」。⁶⁰

那麼中國對於「和平崛起」又期待保有什麼樣的「協調能力」呢？又是否能維持其崛起的可能性呢？孫哲就認為，第一、在確定「與時俱進」的大方向前提下，找到保證與世界其他國家相互交往的有效方式，平衡地推動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價值觀和各自的國家利益，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建立新型的國際關係。第二、建立結構性的預警系統，避免判斷誤差，調節外交進程。第三、及時總結經驗，不斷推廣成功外交合作方式，以合作維護安全，進而全面擴大和深化同其他國家交往的基礎。⁶¹第四、不挑戰或改變現存秩序，並對中國的鄰近國家提供中國崛起後的利益。⁶²

在這種條件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認為中國和平崛起是有可能的，因為中國今後將會逐漸超越日本，在亞洲地區擴張其影響力。但是除非中國和美國之間發生嚴重的衝突，否則中國應該可以透過和平的方式崛起。

布里辛斯基也說：「我相信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可能會與其他國家發生一些摩擦，而中國也正在亞洲地區擴展其勢力範圍。不過，北京將在2008年主辦奧運會，2010年世界貿易博覽會將在上海舉行。在這之前，中國領導人應該會在國際事務上採取謹慎的態度。中國如果與美國發生激烈衝突，那麼中國的貿易、海運和經濟將受到嚴重影響，我不認為這是中國當局所希望看到的。」

63

但是國際政治現實主義派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對此則提出截然不同的觀點。米爾斯海默依據他先前出版的《強權政治的悲劇》一書提出的理論指出，中國的強大是對美國「最可怕的威脅」，因為作為世界唯一區域霸權的美國將無法容許另一個國家成為區域霸權，中美兩國注定要進行一場危險而激烈的競爭，這就降低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⁶⁰ 同註 59。

⁶¹ 孫哲，同註 1，頁 63；〈中國主張加強聯合國作用促進和平與發展〉，《解放軍報》，2003年9月26日，版 4。

⁶² Yoichi Funabashi, "China's Strategy: peaceful ascendancy," Asahi Shimbun, December 3, 2003.

⁶³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4_10_1_17_9_55_72.html

米爾斯海默說：「目前的問題是，究竟中國能不能和平的崛起。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中國維持目前經濟增長的速度，美國將與中國進行激烈的安全競爭。美國將盡力減緩中國發展的速度，包括日本、印度在內的亞洲國家將和美國一起對中國進行圍堵。」他也指出，國際政治的本質是無政府狀態，每個國家爲了確保生存必須擴大權力，而各個區域的強權國家則相互競爭。從 19、20 世紀美國崛起的歷史來看，美國在這段期間除了不斷擴張領土範圍，還採取各種行動防止其他國家成爲區域強權，包括介入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阻止德國和日本的野心，隨後又和蘇聯進行冷戰，在在顯示美國無法容忍另一個區域強權的存在。⁶⁴

儘管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仍然有許多的爭論，但針對中國提出「和平崛起」的理念與作爲，作者認爲可以總結爲是中國期望在「後九一一時代」的國際外交中表現出：一、尋求國際力量多元化，用以遏止美國過度追求擴張性的「帝國戰略」所帶來的威脅性。二、意圖在「道德政治」的理想主義旗幟下，保有自己參與國際對話的空間，並繼續與各國維持合作關係。三、作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尋求與各國建立起預警系統，避免誤判帶來國際衝突與災難。四、主動對國際事務發生影響力，進而參與世界。在這些個目的之下，中國是否能真正的達到「和平崛起」的目標，當然有待理論與現實上的印證才能充分的理解。

參、建構「和平崛起」的新安全觀

從 1997 年中國提出「新安全觀」之後，國際環境在九一一事件以後有了很大的改變。因此，「新安全觀」所服膺的反對霸權主義，反對「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的理念，已經不合時宜，甚且可能引發美中之間的重大歧見與衝突，所以中國學者積極尋求新的安全戰略思維，變成是影響胡錦濤時代建構「和平崛起」外交戰略上的重大課題。

⁶⁴ 同註 63。

原先，江澤民時代的所謂「新安全觀」，其核心價值是在「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各國之間的合作關係。江澤民就為此曾闡述此原則：「各國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是維護和平的政治基礎。互利合作、共同繁榮，是維護和平的經濟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協商和談判，是解決爭端、維護和平的正確途徑。」因此，他也認為：「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觀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才能從根本上促進裁軍進程的健康發展，使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得到保障。」⁶⁵

然而，江澤民在強調「新安全觀」的原則下，仍不忘要批評當時的國際環境是：「冷戰的思維依然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時有表現。強化軍事同盟的傾向有所抬頭，新的炮艦政策正在肆虐，地區性衝突此起彼伏。」⁶⁶在這個前提之下，所謂「新安全觀」，其實是明顯的把矛頭對準霸權主義或強權政治的主導者--美國的意圖，⁶⁷這並不符合中共講求「韜光養晦、絕不當頭」和「永不稱霸」的外交理念。

特別是，在 SARS 疫情與禽流感疫情危機中，讓中國領導人察覺到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是無法切割。面對可能再度出現類似非傳統安全問題，中國以為必須保持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密切合作關係。這種間接轉變的外交思維，讓中國思考到如何以更主動的姿態參與國際合作，並通過更有效的溝通方式面對國際間種種的不穩定性。⁶⁸在國際關係的意義上，此類非傳統安全的威脅，不僅會引發社會危機與政府失信，危及民眾生命財產和國家貿易，並產生新的衝突根源和國際關係新的緊張狀態。⁶⁹

因此，「非傳統安全」所面臨的問題與觀念，變成是胡錦濤就任以後，尋

⁶⁵ <江澤民闡述中國的新安全觀>，參閱
http://www.future-china.org.tw/spcl_rpt/tsr/ts1999032701.htm

⁶⁶ 同註 65。

⁶⁷ 蘇小樺，〈試論江澤民同志的新安全觀〉，《毛澤東思想研究》，2001年第3期，頁96-98；高恒，〈多極化世界需要樹立新安全觀〉，《國際政治與安全》，2000年第11期，頁22-23；張召忠與周碧松，同註63，頁34-44。

⁶⁸ 王逸舟，〈王逸舟：非傳統安全時代的外交思維〉，《經濟觀察報》（北京），2003年5月24日。

⁶⁹ 王逸舟，〈『非典』與非傳統安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頁24。

求中國新的安全戰略架構一項新的思考方向。例如，2002年5月中國提交「關於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中方立場文件」；2002年7月31日中國在東協地區論壇外長會議提交《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2002年11月4日《中國與東協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再次提出「非傳統安全」的概念。2002年11月8日，中共第十六大報告首次出現「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因素相互交織」的提法，在12月20日頒佈的《2002年中國的國防》中也強調防止非傳統安全是中國國防的任務。⁷⁰

另外，在中國學者的討論上，2003年11月14-15日曾由中國外交部主辦一場「非傳統安全論壇」；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也在2003年12月中旬舉辦一場「非傳統安全與中國」的學術研討會，相關論文並逐一的選刊在該所出版的「世界經濟與政治」月刊上。所以，「非傳統安全」這個概念，一時之間儼然變成中國政學界熱中探詢的一項國際安全戰略的新主流思維，也是作為「和平崛起」背後的安全觀的一項重要理念。

當然，「非傳統安全」這個概念，是相對於「傳統安全」在解釋國際事務不足之後，所衍生的一個新的概念。一般認為，「傳統安全」是以軍事行動作為國家考慮安全狀態的主軸，當一個國家感覺它不安全的時候，通常是源自外來的敵人入侵，所以本國必須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進行對抗，使得在外交的操作技巧上，強調以權力為基礎（power-based）的外交手段，以增加軍備與建立軍事聯盟來尋求安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國家之間的恐懼與不安全感，⁷¹它更是一種古典現實主義以國家權力來處理外交政策的模式。因此，傳統上國家在思考其安全狀態時，只是重視國家這個集體產物的安全與否，而不重視國家內部的人民是否遭到被侵犯的情形。

然而，在全球化已經普遍影響到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型態之後，國家之間即使在和平時期，由於互動的頻繁，致使國家之間雖然沒有發生戰爭，也可能產生安全的問題。於是，「非傳統安全」的概念，逐漸被用來解釋和平時期，國家交往所衍生的安全議題。這之中包括人類安全、生態、環保、疾病、金融、

⁷⁰ 翟坤，〈非傳統安全論斷〉，《現代國際關係》，2003年第5期，頁48。

⁷¹ 尹全海，〈江澤民新安全觀初探〉，《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1月，頁8。

資訊安全，甚至是恐怖主義所製造的安全問題等。所以「非傳統安全」所包括的範圍可說是包羅萬象，它不但擴大了安全觀念的意涵，也凸顯以人為主軸的安全思考越來越受到國際間的重視。⁷²而在於外交的操作上，非傳統的安全領域的各種議題，所凸顯的權力意涵，部分國家可以發展不針對第三者的密切合作，在客觀上對共同威脅產生牽制的效用。⁷³

因此，如果比較「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差異之處，主要有以下幾個面向：⁷⁴

- 1、主體不同--傳統安全的主體是國家；而非傳統安全的主體是個人與公眾。
- 2、內容不同--傳統安全重視國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非傳統安全不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而是對於人的生命所進行的關注。
- 3、範圍不同--傳統安全是從外界對內部的威脅；非傳統安全則是內部自發的威脅。
- 4、手段不同--傳統安全是以軍事作為追求安全的手段；非傳統安全的理念是以政治、經濟作為追求安全的手段，並突出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性。

中國學者張麗東就認為，安全是一種公共產品，是政府、組織的公共產品。非傳統安全是一個灰色地帶，傳統安全則是國家主權的突出，非傳統安全則是突出人權的價值。特別是「非傳統安全」在中國、亞洲比較重視，西方並不重視。這是因為非傳統安全在西方已經基本完成，中國還待開展。所以，她明白的指出說：「中國開始重視非傳統安全，是人民的福音。」⁷⁵

只是，「非傳統安全」的概念又如何界定九一一事件以後的國際事務呢？中國學者方葉兵與王禮茂就認為，九一一事件和 SARS 的出現，它們對國際社會所帶來的衝擊，是二次大戰以來所沒有遇過的安全問題，而這種問題所表現的形式與對象以及處理的作法，也是前所未見，如九一一的恐怖攻擊是恐怖

⁷² 陸忠偉主編，《非傳統安全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11月），頁18-19。

⁷³ 參見俞正梁，同註9，頁337。

⁷⁴ 王崑義、蔡裕明，〈全球化、人類安全與後 SARS 時代：兩岸非傳統安全的新議題〉，《遠景基金會季刊》，第五卷、第二期，2004年4月，頁154。

⁷⁵ 張麗東，「非傳統安全與中國」學術研討會上的口頭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主辦，2003年12月20-21日。

組織，SARS 的傳播者是病毒，它們都不是傳統安全上所遇到的某個敵對國家或國家集團。⁷⁶也就是說，它們都不是可以看得見的敵人，因此，使用「非傳統安全」的概念來把兩者一起加以界定，顯然是解釋得通的模式。

另外，中國與東協在 2002 年 11 月 4 日在金邊簽署《中國與東協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安全合作》宣言，中國曾主張「非傳統安全」需要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科技等途徑，並需要加強地區和國際合作。⁷⁷並且在中國與東協在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當中，表示將共同尋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徑，加強海洋環保、搜尋與救助、打擊跨國犯罪與合作等。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更表示，中國和平崛起與全球化進程緊密聯繫，有別於其他國家崛起過程中引起戰爭的作法，中國正在逐步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⁷⁸

所以，「非傳統安全」的概念被當作是胡錦濤時代建立「和平崛起」的安全內涵，本質上被中國學者認為有它的時代意義，也是有別於美國追求以軍事為中心的「傳統安全觀」所做出的區別。解放軍的一位學者傅新就明確的指出，「非傳統安全」是全球化時代追求建立「國家形象」一個最重要的課題。⁷⁹因此，透過「非傳統安全」概念的建構，達到建立中國新的「國家形象」，也是中國建立「和平崛起」新安全觀的一個重要基礎。

在這種新的安全觀的基礎之下，中國有關「和平崛起」的理念，也將被運用到對台戰略的思考上，也就是，中國會把台灣問題納入它的國際戰略設計與思考中的一環，所以，未來兩岸間的問題將被中國改變為「國際問題」，而不僅僅是「國內問題」來進行思考。這之中，尤其是把「台灣問題」當成國際社會的共同性議題，使得台灣任何超越「一個中國」框架外的行動，都可能被當成是一種「挑釁」的行為，國際間為了維持穩定，對台的干涉行動將逐步加大，中國就可以借外力而不需使用武力的壓制台灣的獨立行動。這項國際戰略下可

⁷⁶ 方葉兵與王禮茂，〈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與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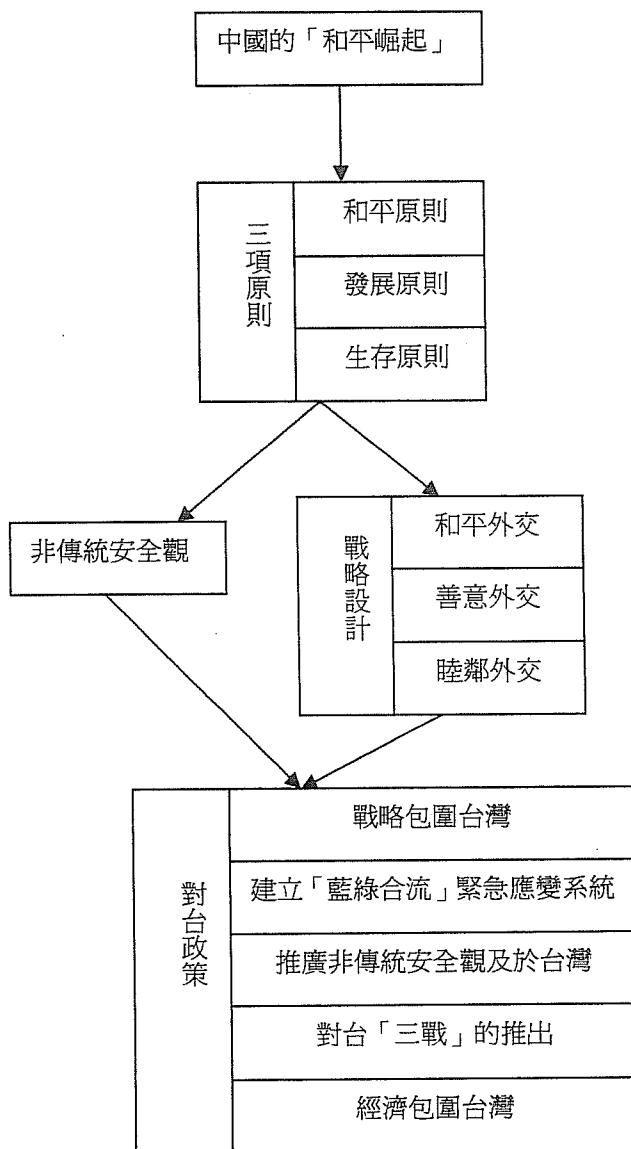
⁷⁷ 〈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02 年 11 月 4 日。

⁷⁸ 〈吳建民讚「和平崛起」〉，《文匯報》，2004 年 3 月 4 日，版 A10。

⁷⁹ 傅新，〈國家形象：全球化時代的非傳統安全命題〉，「非傳統安全與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

能的對台戰略設計，本文即綜合（圖一）和（圖二）的思考，把它連結成（圖三）的表述，並在下一節進行分析。

（圖三）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構圖



圖三由作者自繪，它所表述的是中國建立和平崛起的內涵，以及對國際與對台的戰略設計。

肆、中國「和平崛起」中對台戰略的轉變

在一片「和平崛起」的外交思維中，中國的對台戰略也出現變化。⁸⁰以往中國從美蘇冷戰軍事對峙當中得出，唯有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才是中國阻絕第三者介入台海或南海軍事衝突的基本戰略設計。⁸¹而 1990 年代中國的「大國外交」雖然未能「促統」，但至少達到「防獨」的效果，並擠壓台灣的國際空間。

在 2000 年 5 月中國認為具有台灣獨立傾向的陳水扁就任總統後，轉而以溫和的態度取代對台主戰、迫和的戰略。北京至此已放棄為統一訂定時間表，且降低軍事威脅，北京不再每當台美軍事關係一有進展就對美國抗議。⁸²於是，中國對台政策的一般性原則就是使用不同的手段阻止台灣政府與人民走向法理（*de jure*）上的獨立，防止其他國家承認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地位，並且讓美國不願承諾台灣的安全。⁸³

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中國以為現今兩岸在於「統獨」的問題上處於「不穩定的戰略僵持」的階段，所謂的「戰略僵持」是指雙方各擁有重大優勢，而處於關係停滯的階段，「不穩定」則是指台灣正在衝撞中國最後的底線。⁸⁴反觀台灣，中國促使國際社會孤立台灣的結果，使得台海兩岸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有兩個主權政府的現況逐漸瓦解，也使台灣全力發展民主以形成強烈的制度對比，而在以台灣優先的民主化發展過程當中，台灣自我意識也逐漸崛起。⁸⁵

面對台灣內在的變化，在胡錦濤上台之後為了配合「和平崛起」理念的推出，中國內部就有一股聲音要求對台決策層面也應該「與時俱進」，主要的內容包括有：1、應該承認兩岸是兩個政治實體，或兩個政權；2、承認「中華民國」的事實存在；3、尋求「一國兩制」以外的模式解決兩岸的爭議。針對這

⁸⁰ *Taiwan News*, "Finding Main Thread in China's Taiwan Policy," December 26, 2001, p. 6.

⁸¹ 徐東，〈中共阻絕第三者的戰略設計〉，《中央日報》，1997年7月13日，版3。

⁸² Medeiros and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p. 26.

⁸³ Robert L. Suettinger, "China's Foreign Policy Leadership: testing tim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9(winter 2004), p. 2.

⁸⁴ 時殷弘，〈中國的外部困難和新領導集團面對的挑戰—國際政治、對外政策、台灣問題〉，《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3期，頁38。

⁸⁵ Chris Taylor, "Taiwan's Seismic Shift"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4, 2004, p. A7.

些個建議，甚至有中國的對台研究學者提出這方面的評估報告。

例如，孫哲就主張中國現行的對台政策，應該在轉型中把握兩個「超越」。一是，超越「國共兩黨」合作和衝突的歷史，從根本上把握今後台灣及大陸發展的切實走向和兩岸互動的脈搏；二是，超越兩岸關係本身，從世界發展的角度充實「一國兩制」的實際內容。也就是，他主張中國應放棄「寄希望於泛藍」的想法，更希望把過去堅持的「一國兩制」統一論調，放在國際的框架來檢驗。

在實際的作為上，他也有兩項主張：第一，應把兩德之間成功的統一、正在成型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以及尚需突破的朝鮮半島的統一模式都可供參考和借鏡。他認為，兩德之間意識形態衝突劇烈，但最終達成了民族認同和統一；歐洲一體化是多個主權國家「讓權」妥協的結果；而南北韓之間經濟雖然隔離，政治上的統一卻得到雙方的一致認可。台灣問題則表現為兩岸經濟交流頻繁、深度加大，政治光譜卻出現認知上的偏差。

第二，把「一國兩制」的內容國際化和法制化，一方面是指中國和台灣同時努力，最大限度地在世界範圍內構建兩岸互信、雙贏合作機制，爭取兩岸「共同崛起」的「中華聯邦」的嶄新面貌；另一方面，也特指中國方面應盡早開始著手，提出能夠充實「一國兩制」框架的未來「中華聯邦憲法」等具體內容，以自身政治文明的建設，贏得台灣兩千三百萬同胞的尊重和真誠渴望統一的民意。

當然，這些觀念比較進步的地方，一是，他主張應參考兩德統一和兩韓交往的模式，漸進的達到統一的目的，這是過去台灣方面所常提出的觀點，卻是被中國一再否決的看法。⁸⁶二是，他也主張應參考歐盟模式，讓主權的主張能夠「讓權」與妥協。⁸⁷

另外，在和平崛起的架構下，中國正提出對於台灣的新認識。北京認為至少有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如何認識 20 年戰略機遇期與主權完整的關係；第

⁸⁶ 邵宗海，〈大陸政策與外交突破之尋求—德韓實例之啟示〉，收錄於《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台北：華泰書局，1994年），頁 87-111。

⁸⁷ 〈中國輿論「一邊倒」地為克裡叫好，孫哲：謹慎讀解克裡「一國兩制」言論〉，參閱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Opinion/2004_2_12_8_44_56_483.html

二，如何協調外交政策與解決台灣問題的關係；第三，認識解決台灣問題與現實性的關係。⁸⁸目前中國對台系統的主流觀點，首先是仍然「寄希望於美國」。因此，現階段的對台戰略作為主要可分為以下五個部分：第一，戰略包圍台灣；第二，建立「藍綠合流」的緊急應變系統；第三，推廣「非傳統安全觀」及於台灣；第四，對台「三戰」的推出；第五，經濟包圍台灣。

一、戰略包圍台灣

自從 2003 年底陳水扁總統提出 2004 年 3 月 20 日要舉辦「防禦性公投」以來，中國就不斷的藉由外交操縱的手段，積極影響美國、日本，甚至是歐盟等國家出面關切與施壓。一般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說服美、日等國出面干涉台灣的公投，其中必然有利益交換的因素存在。然而，如果從一個比較深層的國際戰略結構來看，中國所使用的外交策略，不過是一種「包圍戰略」的翻版，並非純粹的只是利益交換的關係。

事實上，從 2002 年 8、9 月份所舉行的「大溪會議」與「三芝會議」以後，陳水扁政府一直是把美國、日本與東協作為建構「亞太民主安全社群」的主要目標。⁸⁹其中，陳水扁政府深切的期待若能成立「美日台三方聯盟」，並在民主、經濟與安全的訴求下，加強三國間緊密的合作關係，那麼在中國經濟磁吸與飛彈的威嚇之下，台灣獨立自主的生存空間才能確保。因此，美、日對台的態度，變成是陳水扁政府能否成功建構亞太安全社群的主要關鍵。⁹⁰

中國深知陳水扁政府的全球戰略企圖。這幾年來，除了加強與東協各國的對話關係之外，並從成立自由貿易區到試圖成立「東協安全體」的方向發展，阻斷台灣向南擴展的可能性。特別是，在陳水扁政府提出「防禦性公投」之後，中國也派出代表團訪問東協國家，試圖影響他們採取對台施壓的外交手段。⁹¹使得台灣總體的「南向政策」，遭到空前的挑戰。

⁸⁸ <國際變局中的台灣問題>，《現代國際關係》，2003 年第 4 期，頁 61。

⁸⁹ Hsu Tung-ming, "Connecting with Japan is Crucial," *Taipei Times*, September 12, 2003, p. 8.

⁹⁰ 王崑義、李黎明，<想像的危機：反恐時代美國的危機建構與台灣的戰略選擇>，《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4 卷第 2 期（2003 年 4 月），頁 98。

⁹¹ 《自由時報》，2004 年 1 月 3 日，版 4。

另外，以往對美國在台灣的立場上，中國一再要求美國切勿涉入屬於中國的「內政問題」，在陳水扁總統提出公投的議題之後，中國仍以威脅相應，並尋求美國協助壓制台灣的公投主張，⁹²並不斷的對美國等國家表示，台灣的公投將會破壞東亞安全，以及改變中國與台灣的現狀，進而危急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⁹³為了阻止台灣所進行的公投變質為統獨公投，中國總理溫家寶於2003年12月訪問美國、美國助理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訪問北京、美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邁爾斯（Richard Myers）訪問中國、中國主管台灣事務的官員陳雲林於2004年2月訪問美國時，中國都一再重申反對台灣所舉行的公投，甚至希望美國在中國的統一上能夠發揮建設性的作用。⁹⁴

特別是，中國在東北亞方面，也不斷的透過各種高層的訪問外交，以及北韓核武問題所衍生的六方會談，牽制美、日在外交上向台傾斜的可能發展。於是，在中國的外交操縱之下，原先被陳水扁政府視為可以當成安全社群三個支柱的美國、日本與東協，卻反向成為牽制台灣對外擴展的網絡，也形成北、東、南全面包圍台灣國際空間的封鎖線。

可以說，當前中國對台政策並未持續堅持是「內政問題」，反而主動把它變成國際性的議題。這個作用主要是把台海問題變成是國際社會的問題，這就像是北韓問題一樣，可能牽涉到國際社會的穩定性，讓各國出面壓制台灣獨立的空間，中國自身就可以避免使用武力，得以保持「和平崛起」的發展環境。這個觀念，北京大學教授朱鋒在美國的一場討論會中就曾提出類似的觀點。⁹⁵因此，台海問題變成國際性的共同問題，反而是中國壓縮台灣國際空間，以及台獨可能在國際社會發展的新式「制台」戰略。所以，過去台灣傾向獨立的人士期盼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夢想，未來可能是變成台灣在擴展國際空間與邁向台獨之路的一場夢魘。

⁹² *New York Times*, "Unneeded Quarrel Over Taiwan," December 6, 2003.

⁹³ Leslie Lopez, "Beijing Urges the U.S. to Oppose Taiwan Vote," *Asian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9, 2004, p. A. 1.

⁹⁴ <中共：盼美對台海統一發揮作用>，《中國時報》，2003年3月12日，版A13。

⁹⁵ 朱鋒，〈為什麼公投等於戰爭〉。參閱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Opinion/2004_3_9_10_26_27_483.html

二、建立「藍綠合流」的緊急應變系統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楊潔勉曾提出，中國應「加強危機管理，特別防止台灣問題干擾和破壞戰略機遇期」。⁹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慶寶在 2003 年 12 月與作者的訪談中，提到當前中國對台政策最憂慮的是「藍綠合流」，特別是在連戰提出「新憲三部曲」、⁹⁷新的「一邊一國論」，以及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認為「不排除將台獨列為台灣人民未來的選項」等，⁹⁸中國更覺得台灣的政黨政治已經脫離了他們可以控制的範圍，因此，如何建立一個對台的「緊急應變系統」，變成是中國當務之急。

在孫哲的文章中，也特別提到：「台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爲了在未來幾年實現台灣獨立，已經開始推出公投立法、修憲以及去中國化的行動，對於台灣島內形勢的變化，祖國大陸逐漸調整了對台策略，開始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危機處理機制。」⁹⁹

那麼，中國又將採取怎樣的「緊急應變系統」或「危機處理機制」呢？在多維新聞網的一篇文章中就討論到，中國對於台海局勢和日後處理台海危機的安全機制上，已經作出了相應的調整。主要是在中國最近才通過的第四次修憲當中，將有關「戒嚴」的規定以「緊急狀態」所取代；所謂的「緊急狀態」是在中國遭受包括安全問題在內的重大事故所採取的應對措施；一般認為，「緊急狀態」將會在日後的台海危機中起到緩衝作用，讓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前有一個迴旋的空間。而胡錦濤在會見台商時說到所謂的「無論政治生態如何」，是包括兩岸發生緊急狀態，軍事衝突或戰爭時，台商在大陸的權益都會受保護。¹⁰⁰

另外，中國也積極的展開「統一法」的制訂，它的目的與發展主要可以歸

⁹⁶ 楊潔勉，〈重要戰略機遇期與中國外交的歷史任務〉，《中國外交》，2003 年第 12 期，頁 13。

⁹⁷ 〈連拋領土變更、修憲案公投〉，《聯合報》，2003 年 11 月 22 日，版 3。

⁹⁸ 〈連戰也提「一邊一國」〉，《聯合報》，2003 年 11 月 21 日，版 1；〈不排除台獨選項，藍軍三度討論〉，《聯合報》，2003 年 12 月 17 日，版 4。

⁹⁹ 孫哲，同註 1，頁 62。

¹⁰⁰ 〈北京調整對台政策〉；參閱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3_12_29_8_42_36_726.html

納為：

(一) 以往中國將「一中原則」定位為兩岸底線，但還是模糊、有伸縮空間，而「統一法」則是將中國對台政策的底線明確化，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都要說清楚講明白，也試圖告訴台灣他們要掌握兩岸的主導權。

(二) 「統一法」可以理解為兩岸問題的時間表，不可能久拖不決。

(三) 中國高層對兩岸形勢的評估並不樂觀，認為軍事手段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制訂法律意味著懲罰，意味著相應的制約，這可以理解是替未來可能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

(四) 目前該法仍處於研究階段，並沒有進入實質的立法準備期，主要還是在觀察 2004 年底台灣立委選舉的結果與演變，一切都只是在籌備中，作為一種法律預擬的階段。

而中國在英國的僑領單聲十月初在北京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透露，他從中國有關方面得知，中國政府正在抓緊對「統一法」進行討論修改，在適當時候一旦人大通過後，將會出台並實施。他認為北京已將其「後發制人」姿態扭轉為「搶先出手」政策，正加緊草擬「統一法」。該法將為人民解放軍遏制「台獨」及推進國防現代化提供法律基礎，對台灣來說，則是一個嚴肅的宣告，無異是對「台獨」分子下達的最後通牒。¹⁰¹單聲就是 2004 年 5 月，溫家寶訪英時向他提出「統一應該立法」建議的人。

對此，中國學者李家泉也認為，「統一法」具有兩大目標。一是反對台灣新憲，提出實現中國統一的進程安排。二是與美國的台灣關係法鬥爭。因此，李家泉表示，「統一法」將先從法律層面明確兩岸統一的大方向；其次預料將提出中國統一的大致進程，設定各階段具體任務與目標。不過，未來制定的「統一法」會具有彈性，不會明確定出某年某月為最終統一的時間表。¹⁰²

中國的臺灣問題專家郭震遠則認為，「統一法」應該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

¹⁰¹ <北京搶先出手加緊制定統一法>；參閱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4_10_4_14_51_21_130.html

¹⁰² 李家泉，<中國訂統一法展現胡溫對台新思維>；參閱

<http://www.epochtimes.com/b5/4/5/16/n540509.htm>

內容：¹⁰³

(一) 它要規定立法的宗旨。宗旨就是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和主權領土完整，推進中國統一的進程，這個宗旨在中國的憲法中有體現，但在「統一法」中應更具有針對性、更加明確。

(二) 它要規定有關國家統一相關的方式和方法，當然是包括和平的方法和和平的方法。

(三) 它要規定在甚麼樣的情況下，應當實施緊急狀態，使用非和平的方式，包括進入戰爭狀態來維護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

(四) 它要規定對於破壞國家統一、分裂國家、分裂國土的行爲應當實施何種懲罰。

另一方面，在「緊急應變系統」的建構中，中共中央所成立的「中央對台領導小組」也已經啓動了決策權，並定期的舉行會商機制，以協調意見。同時，也加強了與退休的台辦官員、高級智囊人士、學術機構和高等學府的諮詢與委託研究活動。特別是，中國並已經啓動所有的對台系統，動用所有的關係向台灣尋求兩岸關係的解套之道，以及因應台海變局的看法。

當然，中國目前對台的「緊急應變系統」，主要還是爲了預防台海危機的發生，避免雙方走向兵戎相見的局面，破壞中國在「戰略機遇期」中繼續尋求經濟發展的可能性。

三、推廣「非傳統安全觀」及於台灣

中國逐漸瞭解認爲對台灣採取傳統的軍事威脅，將在台灣島內建立起「反中」的情緒。¹⁰⁴在2003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舉辦的「非傳統安全與中國」的研討會中，中國的學者就針對是否該把「台灣問題」納入「非傳統安全」的思考範圍，曾激發了一場辯論。清華大學教授楚樹龍首先指出：「台灣問題是中國當前最嚴重的傳統安全議題，台灣問題不能解決，

¹⁰³ <臺灣問題專家：國家統一法應包括四方面內容>；參閱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zxs_2004-10-05_490925.shtml

¹⁰⁴ *Taipei Times*, "Military Shows Its Might Today in Display for Public," September 04, 2003, p. 4.

所有的中國非傳統安全議題都難以化解。」

楚樹龍的論述立即引來外交學院教授蘇浩的反擊，他說：「解決台灣問題還是應該採用非傳統安全的手段，例如推動東亞區域合作，把台灣問題融入東亞區域合作之中，這樣就可化解兩岸的爭議。」同時，「台灣問題也應該納入中國的公共安全問題思考，類似 SARS 病毒傳染所引發的安全議題。如果把台灣的公共安全排除在中國的非傳統安全之外，中國也不可能達到自身安全的目的。」

遼寧大學的教授耿麗華也呼應蘇浩的說法指出：「台灣問題是存在傳統安全的議題，也存在著非傳統安全的議題。不管它是以傳統安全的問題存在，或是非傳統安全的問題存在，都應該以非傳統安全的手段來解決傳統安全的問題。」她並語重心長的做結論說：「把導彈丟到台灣，還不如把錢省下來，拿去搞好幾個黃土高原，多留幾個台灣要好。」¹⁰⁵

當然，「台灣問題」是否該納入中國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來思考，在中國的學界目前還僅止於辯論的階段，但如果從台灣存在的價值性來思考，可能更能在兩岸之間尋求解套之道。

從價值性議題來看，有些中國的學者已經逐步認識到台灣內部統獨的爭議，其實都只是為了尋求台灣的生存目的，而這個生存的價值包括民主的制度與生活方式的保存。為了維護這樣一個生存的價值，不管統獨立場的人士，都必然會增加武器的需求，以作為最後的「防禦」之道。

當然，台灣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戰略需求，只因地緣戰略上無法擺脫中國對台的牽制，因此，不管任何一個黨的人士當選總統，都難以超脫這個被地緣戰略所命定的格局。他們認為：「一旦屬於中國的，就永遠屬於中國」，而這項思考也正逐漸融入中國領導著的戰略考量當中，既然中國遠程的目標是在東亞與西太平洋建立朝貢體制，對於海洋的控制就成為中國近程到中程所設定目標，台灣與台灣海峽將左右 70%從中東到日本或和韓國的運油管道，¹⁰⁶台灣在地理上成為中國東向出海的戰略前沿。在軍事地理的意義上，中國海軍軍事學術研

¹⁰⁵ 以上的辯論，均為作者參與「非傳統安全與中國」學術研討會時所做的筆記。

¹⁰⁶ Chen Pi-Chao,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East Asia," *Taipei Times*, September 12, 2003, p. 9.

究所所長姜志軍就表示，台灣可以化解中國海上的安全戰略問題。¹⁰⁷

於是，對於台灣的安全生存而言，若以戰略圈層來區分，台灣的生存價值可以擺在最核心的位置，武器系統的建構擺在第二圈層的位置，地緣戰略就可以放在最外圍的空間。透過這個圈層的戰略性思考，它就決定了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基礎，這也使得兩岸關係存在既是傳統安全，同時也是非傳統安全的戰略關係。在這種安全的認知架構下，北京大學的教授朱鋒就主張，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觀念並非是對立的，中國的學者更應該重視剛剛起步的非傳統安全的研究，但卻不必把安全的觀念「泛化」，認為什麼問題都該從傳統安全來進行思考。¹⁰⁸

在這樣的趨勢之下，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傾向將兩岸問題視為非傳統安全議題來進行思考。這方面發展主要立基於，第一，從安全水平的範圍擴大而言，非傳統安全可以延伸中國的地緣安全及於台灣，反而可以排除與台灣之間主權鬥爭的僵局；其次，從安全的垂直擴大而言，中國對於非傳統安全的擴大，可以越過國家這一層次，直接介入台灣的社會與人民；第三，非傳統安全凸顯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中國認為與台灣在非傳統安全上的合作，反而可以直接壓制台灣在國際上的聲浪，間接提升中國力圖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作法；最後，學習台灣解決非傳統安全的作法。由於中國正面臨經濟、社會乃至於政治的轉型，在國家轉型的過程當中，不可避免的出現許多問題，如生態污染、農民、農村與農業的轉型、糧食安全、勞工運動等，而這些都是台灣在 20 年前所曾遇到的問題，使得中國可以學得將台灣轉型的經驗使用於中國大陸。

四、對台「三戰」的推出

在和平崛起的背後，中國在解決台灣問題上除了不放棄武力使用的主張外，也積極的使用非軍事手段，企圖達成軍事目標，其中尤以「對台三戰」的

¹⁰⁷ 姜志軍，「中國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所長談中國海上憂患」，《解放軍報》，2004年1月1日；Paul Lin, "PRC agenda in Pacific Starts With Unification," *Taipei Times*, January 7, 2004, p. 8.

¹⁰⁸ 以上的論述均為作者在參加「非傳統安全與中國」研討會時，在會外的討論會中所得的結論。該場討論會的與會者主要的有北京大學的教授朱鋒、王正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的研究員李少軍、李東燕與復旦大學的教授王義梳等。

思考為最。中國推出的「對台三戰」—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最早是由江澤民所提出，也是針對美伊戰後整個戰爭形勢的改變，對共軍所做出的一種新的戰略發展的訓示。特別是後來被寫入中共中央軍委會所頒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之後，中國軍隊就普遍展開「三戰」的研究。

特別是，2004年以來中共中央軍委會機關「解放軍報」，以及中國軍隊各大軍區報紙先後刊登了「透視信息化戰爭中的新聞輿論戰」、「法律戰走進現代課堂」、「學好用好戰爭法」等大量有關開展「三戰」學習、研究和訓練的文章，在宣傳上加大了力度，掀起了解放軍研究「三戰」的風潮。

事實上，在解放軍的觀念裡，現代意義上的「三戰」，主要是指以己方贏得利益或造勢為目的，而向對方所實施的非武力的輿論強制、心理強制與法律強制，因此，與「三戰」相關連的三個戰爭要素分別為：（一）從「三戰」的強制領域來看，其強制的領域分別為輿論領域、心理領域和法律領域；（二）從「三戰」的強制類型來看，其強制的類型主要是非武力類型；（三）從「三戰」的強制途徑與手段來看，它是通過運用各種新聞媒體及宣傳機器，通過運用各種「影響正常心智與思維」的攻心手段與宣傳，以及運用各種國內外法律法規，以給對手造成輿論的、心理的和法律的強制，並藉以為己方造勢或實現己方的利益。¹⁰⁹

從這些要素來看，所謂「三戰」，就是指「以己方造勢或贏得利益為目的，通過在輿論領域運用各種新聞與信息媒體及宣傳機器、通過在心理領域運用各種「影響正常心智與思維」的攻心手段與宣傳，以及通過在法律領域運用各種國內國際成文與非成文法律的法規、基本原則和準則，向對方所實施的非武力的輿論強制、心理強制與法律強制的行為。」¹¹⁰

中國「三戰」實際上已經在解放軍內部大舉實施。先從法律戰來看，法律戰的開展主要是讓共軍官兵學習了解「國際法」、「武裝衝突法」、「懲治戰爭犯罪」和相關法律，正確掌握法律戰的根本目的、基本原則、作戰樣式和手段，

¹⁰⁹ 「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三戰的研究與訓練」；《解放軍報》，2004年7月16日。
<http://chinanews.sina.com/jczs/2004/0716/023831267.html>

¹¹⁰ 同註 109。

闡明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正義性、合法性，充分發揮「先法後兵、兵以法行、兵止法進」的法律戰作用。

再以心理戰來看，心理戰是解放軍的老傳統戰法，「瓦解敵軍」也是毛澤東在戰爭年代為共軍提出的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之一，其他的兩項原則是「官兵一致」、「軍民一致」。但多年來解放軍並未設立專門的心理戰部隊，直到 1991 年波灣戰爭以後，解放軍才開始重視培育心理戰人員。

目前，解放軍在各大軍區都建立了心理戰試驗部隊，在軍事院校也相繼設立了心理戰專業科目，成立心理戰研究所，解放軍所培育的首批心理戰軍官也已經分配到陸海空三軍任職，並不斷的出版所謂「心理戰訓練教案」、「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心理影響及對策」、「山地進攻戰鬥心理打擊資料彙編」等心理戰教材，顯示解放軍正日益重視心理戰的研究與訓練。

而在輿論戰方面，解放軍對輿論戰的重點研究是掌握新聞輿論，在充分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網路、電子郵件、行動電話等現代技術手段，形成立體宣傳，給予對手產生強大的輿論壓力。

上述的「三戰」各有特色，輿論戰主要是「面對大眾」，可以從政治上體現己方進行戰爭的意志和主張，通過造勢、震攝、離間等策略，為心理戰、法律戰提供有利於己方的輿論環境。心理戰則是「面向敵軍」，側重於影響敵方情感和意志，因此它不單是運用信息等「軟性」的手段，有時也可以使用武力等「硬性」手段來達成目的。例如美軍在伊拉克戰爭時所使用的「斬首戰略」與「震撼戰法」，作為打擊敵方繼續抵抗的意志與決心。法律戰主要是「面向世界」，它對戰爭的性質、戰爭的合法性等的判定具有重要作用，也是為輿論戰、心理戰提供法理基礎。所以「三戰」的區分只是相對性的，在實際的操作中它們是互為支援、互做條件，唯有實現三者的結合，才能產生政治、軍事所需要的綜合精神，最大限度的擴展軍事行動的政治影響和精神殺傷力。

從「三戰」到「對台三戰」的運用來看，其實在 2004 年台灣總統大選以後，中國對台戰略作為出現了一些問題，因為類似 2000 年朱鎔基的警告性言詞，並未嚇阻陳水扁當選的事實；2004 年中國的不作為，也沒有阻擋陳水扁連任的結果，因此重塑對台戰略，變成是中國因應未來四年阿扁總統可能從公

投跨越到制憲的「艱鉅工程」。

然而，在現實情況下，中國能夠影響台灣的工具相當有限，所以如何整合「三戰」變成對台的有效戰略工具，這是他們一直在集思廣益的地方。目前，中國正製造一個「非戰爭軍事行動」理論，作為整合「對台三戰」的行動基礎，認為只要不是戰爭，那麼為達成一定政治目的而展開的軍事行動，都可歸入「非戰爭軍事行動」之列。¹¹¹這個理論的行動準則是以「升高戰略」(escalation)為基礎逐步對台施壓，首先是以江澤民所提出的「三戰」(法律戰、輿論戰和心理戰)作為軟殺手段；其次再使用低度武力衝突的「斬首戰略」作為硬殺，對台構成軟硬兼施的威嚇效果。

在這兩項前提之下，中國未來對台施行的戰略威懾，以這種非戰爭的行動模式取代戰爭行爲，應該是在「和平崛起」的理念中，對台最有可能採取的低度衝突行爲。

五、經濟包圍台灣

中國外交得以進行「和平轉型」的一項主要驅動力為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近年來中國成為最快的經濟成長速度以及經濟總量的不斷增加，讓中國得以擴大其戰略空間。¹¹²經濟的發展也讓中國對國際事務有更多的迴旋餘地，在對於台灣的戰略上，以中國內圈的架構，透過兩岸經貿交流以達成「以經濟促進統一」與「發展中國經濟」的雙重目標；¹¹³而在亞洲內圈的框架下，以東協加一、東協加三與《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下，以雙層的經濟架構包圍台灣。

為了從經濟層面直接進行對台工作，中國在2004年1月6日成立「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從兩岸關係的戰略而言，「海貿會」的成立是中國對台政

¹¹¹ 元原，〈中國軍演的戰略威懾意義〉；刊於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4-07/31/content_1685823.htm

¹¹² 郭震遠，〈新世紀我國面臨的重要國際戰略機遇〉，《中國外交》，2003年第12期，頁3；David Murphy and Shada Islam, "It's More Than Lov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12, 2004, p. 26.

¹¹³ 童振源，〈中國對台政策的演變、特徵與變數〉，收錄於《胡錦濤時代的挑戰》，由丁樹範編（台北：2002年），頁322。

策的新作為。首先，中國仍將繼續吸引台資，並將對台商服務列為重點，同時將中國政府的工作從行政管理轉化為服務的職能，促進兩岸非官方的形式推動兩岸經貿。其次，面對台灣可能出現的變數，中國以經貿包圍台灣，以大中華經濟融合的型態，切割台灣的分裂意圖，¹¹⁴實踐兩岸交流應當是「民間對民間，行業對行業」。¹¹⁵再者，中國將以「海貿會」的經濟功能，在經貿合作的基礎上與台灣進行對談。最後，未來將以「海貿會」為專門處理兩岸經貿經濟摩擦的機構，防止其成為新的政治問題，而讓海協會處理兩岸之間的政治問題。

而在亞洲內圈的區域經濟架構下，中國於 2002 年 11 月 4 日，簽署《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計畫在 2010 年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會中中國與東協簽署了《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國農業部和東協秘書處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向柬埔寨、寮國、緬甸提供特殊優惠關稅待遇的換文》、《中國和寮國政府關於建設昆曼公路寮國境內部分路段項目的協議書》、《大湄公河次區域便利貨物及人員跨境運輸協定》、《大湄公河次區域政府間電力貿易協議》、《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確認了：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啓動大湄公河流域的開發合作與開啓中國與東協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¹¹⁶並且在 2003 年 10 月與東協所簽署的《中國—東協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皆象徵著中國正以經濟帶動區域地緣擴展，力圖將中國大陸與東協整合為更大的貿易市場。

另外，在 2004 年 3 月所召開的政協、人大兩會當中，福建省代表建議中國中央賦予福建省的特殊對台政策，可以設置閩台自由貿易區和閩台高科技園區，建立「海峽西岸經濟繁榮地帶」，用以連結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成爲環太平洋經濟貿易區。¹¹⁷

從東協加一、東協加三或 CEPA 等東亞經貿架構的成形，逐漸的以經濟的力量將台灣進行包圍，並擠壓台灣以經濟的力量參與國際經貿體制的可能性，

¹¹⁴ 〈解讀兩岸政策的新棋法：海貿會〉，《聯合早報》，2004 年 1 月 11 日。

¹¹⁵ 〈大陸海貿會成立，白手套談通商〉，《聯合報》，2003 年 1 月 7 日，版 13。

¹¹⁶ 王敏正，〈論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中的重要載體作用〉，《雲南財貿學院學報》，2003 年 3 期，頁 88。

¹¹⁷ 〈促兩岸經濟共同發展，統一將水到渠成〉，《文匯報》，2004 年 3 月 4 日，版 A10。

讓台灣的經濟發展，只能夠更加的依附中國大陸。

整體而言，中國認為在「和平崛起」的進程當中，最大的問題便在於台灣的獨立問題，¹¹⁸因此，中國試圖以「和平崛起」的理念作為化解台灣問題的工具，他們主要的思維有：第一，中國「和平崛起」可以化解他國心理障礙，間接難以接受「台獨問題」；第二，中國「和平崛起」是更加溶入全球經濟體系，開放的體系是可以化解不利的因素，自然包含台獨；第三，中國「和平崛起」會帶動亞洲崛起，而台灣獨立的過程將引發兩岸戰爭，自然連累到亞洲崛起。¹¹⁹透過這樣的思維，以阻止台灣走向獨立之路。

伍、結論：台灣的挑戰

從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對台的戰略設計上思考，在總統大選以後台灣將面臨「第二個危機時代」所帶來的「非國家化」的困境。在無法接受「一國兩制」與「一中原則」的前提下，台灣如何維持國家的主體性，如何保持既有的國際空間，將考驗未來總統的智慧。

所謂「第二個危機時代」是指台灣與中國關係所呈現的特質。在去年陳水扁提出公投、制憲以前，中國幾乎是把台灣問題視為「國內問題」，因此，常會做出過激的對台文攻武嚇的舉動，這是「第一個危機時代」的特質。由於威脅的主動者是在中國，所以國際間對台灣所面臨的中國威脅感同身受，台灣可以在國際間以一個主權國家的事實，獲取國際間的同情與支持。

然而，從陳水扁提出要進行「防禦性公投」以後，中國改由國際間施壓，主動把台灣問題變成國際問題。當然，不明就裡的人會樂於看到中國的做法，但如果反思中國敢於這麼做，必然有它的盤算存在。

事實上，從九一一事件以後，國際間已經出現三種行動者作為國際行為的單元，即大國、小國與團體，它們共同改變傳統以主權國家作為行為體的思考模式與行為規則。這項新的行為規則，主要是在國際「群聚效應」之下，區域

¹¹⁸ 劉德喜，〈中國戰略機遇期：意義、內涵、問題〉，《中州學刊》，2003年第5期，頁14。

¹¹⁹ 〈「和平崛起」與亞洲問題〉，《中國評論》，2004年2月號，頁29。

間的大國將牽引區域間的小國，共同對區域間的非國家團體進行約制的集體行動。只要被大國認定是具有挑釁動作的行為者，區域間的國家很容易會群起攻之。特別是小國或國際團體若脫離國際制度的規範所進行的活動時，由於有恐怖組織的先例，因此它受到國際間的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從這種情況來看，中國在 2004 年台灣的總統選舉與公投中並未採取文攻武嚇的行動對台施壓，絕非是它對台灣政策的讓步，而是它正積極以「群聚效應」，讓台灣變成一個區域安全的挑釁者，相對於它在國際間所宣揚的「和平崛起」口號，區域間的穩定與否責任就會落在台灣的身上，而不是在中國。等到蓄積一定的能量後，即使不以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也可能像對付疆獨一樣，逕行宣佈台灣政府為恐怖組織，讓國際間不敢跟台灣多所往來。

對於這種假設的情況，也許有人會認為不可能，或者認為在國際間產生的效用也不大，甚或以為中國的所有作為，只要有美國力挺台灣，就不必擔心中國「鴨霸」的一面。但做為一個改變中的國際戰略情勢，不能不對未來可能產生的變化未雨綢繆。

畢竟，在「第二個危機時代」中，國家的「非主權化」可以透過「主權讓渡」，或是集體力量來壓制小國的國際空間，這樣可以讓小國無法再以主權的訴求，獲得國際的認同。也就是，中國在國際間的身段越軟，甚至對台做出更多的「主權讓渡」的舉動，就越可能獲得國際間的支持，台灣即使有美國力挺，除了可獲得安全的保障之外，其他在國際空間的開拓上，恐怕仍會面臨很大的困境。因此，未來中國是否可能以國際力量逼迫台灣跟它談判，卻不是不可能發生的情況。

問題是，台灣若與中國走上談判桌，如果在主權的認同上無法讓國際間認可，那麼台灣出現「非國家化」的情形也可能會發生。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台灣與中國之間是否維持目前起碼的僵持狀態，讓台灣持續保持主權獨立的現狀，可就得看中國所製造的國際「群聚效應」，是否會被國際間所接受，否則台灣的國際處境只會出現越來越多的挑戰。